

元史论丛

第四辑

元史研究会编

中华书局

元史论丛
第四辑
元史研究会编

元史研究会编

局

元史论丛

第四辑

元史研究会编

中华书局

本 辑 责 任 编 辑 组

杨 讷 周良霄 姚景安

元 史 论 丛
YUAN SHI LUN CONG

第 四 辑

元 史 研 究 会 编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侨中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16 · 17 1/2 印张 · 352 千字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定价: 9.25 元

ISBN 7-101-00346-X/K·157

目 录

关于元代回族史的几个问题	杨志玖 (1)
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	周清澍 (9)
早期蒙宋关系	胡多佳 (31)
蒙古国汉军万户问题管见	王 頔 (59)
元代的宗王出镇	李治安 (71)
元代侍卫亲军建置沿革考述	史卫民 (84)
元世祖时期台察与权臣的斗争	郝时远 (110)
浅析元军攻取临安的战略战术	李鹏贵 朱清泽 (123)
元代的流民问题	陈高华 (132)
两都巡幸制与上都的宫廷生活	叶新民 (148)
大德七年平阳太原的地震	闻黎明 (160)
元代的白云宗	丁国范 (173)
爱猷识理达腊与元末政治	韩志远 (183)
龙凤年间的朱元璋	杨 讷 (196)
元代乌思藏本钦纪略	陈庆英 (230)
元代经营朵思麻地区概述	仁庆扎西 (249)
论塔剌思会议	刘迎胜 (256)
牙老瓦赤卒年补证	陈得芝 (266)
王先谦与《蒙古通鉴长编》	汤开建 李直中 (269)
《庚申外史》作者权衡小考	温岭 (70)
姚枢和伯颜的生卒年	遙寒 (147)
小考一则	周良霄 (182)
从职田租佃看元代吏治的腐败	孟繁清 (195)

CONTENTS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the <i>Hui</i> Nationality in the <i>Yuan</i> Dynasty	Yang Zlijiu
The Overl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	Zhou Qingshu
The Early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gols and the <i>Song</i> Dynasty.....	Hu Duoqia
The <i>Han</i> Army Myriarches before the <i>Qubilai's</i> Reign.....	Wang Ting
The System of Military Garrisons of the Princes in the <i>Yuan</i>	Li Zhi'an
A Surve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mperial Personal Army in the <i>Yuan</i> Dynasty	Shi Weimin
Struggles in <i>Qubilai's</i> Court between the Supervisors and the Influential Ministers.....	Hao Shiyuan
Mongol Strategy and Tactics in the Conquest of <i>Lin-an</i>	Li Penggui & Zhu Qingze
Vagrants Problem in the <i>Yuan</i> Dynasty.....	Chen Gaohua
The System of the Emperors' Seasonal Staying in the Tow Capitals and the Imperial Court Life in <i>shang-du</i>	Ye Xinmin
The Earthquake of <i>Ping-yang</i> and <i>Tai-yang</i> in the Seventh Year of the <i>Da-de</i> Period.....	Wen Limin
The White Cloud Sect in the <i>Yuan</i> Dynasty.....	Ding Guofang
<i>Ayushiridara</i>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Late <i>Yuan</i> Period.....	Han Zhiyuan
<i>Zhu Yuanzhang</i> during <i>Long-feng</i> Period.....	Yang Na
The <i>Dpon-chen</i> of <i>dBus gTsang</i> in the <i>Yuan</i> Dynasty	Chen Qingying
Administration of the <i>yuan</i> in the Region of <i>mDo-smad</i>	Rin-chen bkra-shis
On the <i>Talas Quriltai</i>	Liu Yingsheng
In Which Year Did <i>Yalavachi</i> Die?.....	Chen Dezhi
<i>Wang Xianqian</i> and His <i>Meng-gu Tong-jian-chang-bian</i>	Tang kaijian & Li Zhizhong

关于元代回族史的几个问题

南开大学 杨志玖

一、探马赤军和回回军

长期以来,一些研究回族史的同志多把元代的探马赤军作为回回人组成的军队,又因探马赤军在平时“下马则屯聚牧养”,也曾“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并见《元史》),因而认为这些探马赤军逐渐变成了农民,成为后来回回农户、回回村落的主要来源。这一说法,直到一九八二年印刷的《回族简史》,依然不变。

我认为,这一说法不确,应予辩正。

(一)首先,应该弄清楚,探马赤军是由什么人组成的。这是问题的关键。

《元史》卷九八《兵志》说:“若夫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这是《元史》对探马赤军的解释。这个解释过于简略而不明确,给治史者带来不少难题。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说,蒙古军由蒙古人组成,而探马赤军则由蒙古人以外的各个部族组成。但是,元代部族很多,元末人陶宗仪的《辍耕录》上列举当时的部族说,蒙古人有七十二种,色目人有三十一一种,汉人有八种。虽然数目并不确切,但总是不少。即令除去蒙古人不计,单色目人和汉人也不少。何以见得探马赤军一定是回回军呢?此其一。

其二,假如各部族的军队都称为探马赤军,为什么在《元史》上还经常出现“汉军”、“契丹军”、“女真军”、“色目军”、“回回军”、“阿速军”、“唐兀军”等名目呢?

要弄清楚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而应该从事实着手,即探讨探马赤军组成的情况。

据《元史》记载,探马赤军是在成吉思汗十二年(公元一二一七年)令其大将木华黎伐金时组成的。组成探马赤军的部族是弘吉剌、兀鲁兀、忙兀、札剌儿和亦乞烈思五部,这五部都是属于蒙古的部族,统帅他们的五部将如阔阔不花等,也都是蒙古人。^①这说明,最早组成的探马赤军,不是色目人,而是蒙古人。而且从时间上看,两年以后,即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才西征回回国,探马赤军当然不可能由回回人组成。

当然,这只是探马赤军初期组成的情况。随着蒙古的西征,确有许多被征服的部族被编为探马赤军。据《元史》及《元典章》等书所载,色目人之编为探马赤军者,有畏兀儿人、康里

^① 参看拙著《元代的探马赤军》,《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一九六五年。

人、阿速人,此外还有汉人。可以推想,其他色目人,如回回人,也有编为探马赤军者,但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关记载。从而可以设想,即令回回人中有探马赤军,也不会很多,否则不会毫无记载。

既然探马赤军主要由蒙古人组成,为什么《元史》上说“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应该怎样理解“诸部族”的意义呢?

最早对“诸部族”提出解释的是俄国的帕拉基主教,他认为诸部族是“从异民族,如契丹人、突厥人等征调的军队”。日本蒙古史学者箭内互则认为诸部族是“指蒙古人以外之北族,即契丹人、女真人等”。^①这些解释,都和最早的事实不合,只不过望文生义,在字面上和《元史·兵志》所说的协调而已。

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其名著《史集》中,有几句解释探马的话,值得注意。他说:

“探马军,也就是被指定从各千人队、百人队中抽出人来组成的军队,被派赴某地区长期驻扎者。”^②

这就是说,探马赤军是从各支部队,即千人队(千户)、百人队(百户)中抽调出来而组成的混成部队。由于各千人队、百人队原来是属于各个部族的,因此,探马赤军也就是各(诸)部族组成的军队了。拉施特虽然无从知道《元史·兵志》上关于探马赤军的说明,但他上面的话却是《元史·兵志》所说“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这句话的最好的注解。

总之,从探马赤军的民族成分看,它与回回人的关系并不大,虽然不能排除其中有回回人,但为数不会太多,更不能把探马赤军和回回军等同起来。

(二)其次,谈一谈探马赤军的屯田、入社问题。

《元史·兵志》在论及蒙古军和探马赤军的职守时说他们“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一些同志认为“屯聚”即是屯田,“牧养”即是牧畜工作。这当然可以。但《元史》上很难见到探马赤军屯田的例子。《元史·兵志》“屯田”部分未见记载,只在《顺帝纪》有一条,即“至元三年十二月,命阿速卫探马赤军屯田”(卷三九)。但阿速人(今苏联高加索山脉北部一带)并不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人。^③由此而引申为探马赤军的屯田区即为后来各地的回回营或回回村,并无直接的历史根据。在元代,探马赤军主要用于行军征伐和镇戍各地,屯田不是他们的重要任务。至于“牧养”,探马赤军在各地确实占了不少牧场,但都是些“牧马地面”,也就是为骑兵而设,由此而引申为“后来回回农户之多以牧放牛羊为副业的开端”(《回族简史》六页),未免牵强。

关于探马赤军的人社问题,也是值得怀疑的。

① 参看《探马赤军问题三探》《南开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② 参看商务印书馆汉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一六〇页正文及《探马赤军问题三探》。

③ 《庚申外史》曾称阿速军为绿睛回回,这和《元典章》卷五七《刑部·禁宰杀》称朮忽(犹太)为朮忽回回一样,是把回回作为一种泛称西域人的广义用法,并不意味这些人信伊斯兰教。

《元史·食货志》确实有“至元十年，令探马赤随处入社，与编民等”的记载，但这只是一道纸上公文，并未认真执行。《元典章》中有两宗文件，说明了真实情况。一条标题是《复立大司农司》，至元十年颁布。里面说，由于“探马赤等军户推避不肯入社”，因而“圣旨到日”，要他们“并行入社”。又一条标题是《蒙古军人立社》，发于至元二十九年。大意是，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人若与“汉儿民户一同入社”，则军队数目易被地方官吏得知，这是不合军事保密体例的，因而他们请求各自另行立社。这一要求得到圣旨允许（《元典章》卷二三，户部卷之九）。可见，自至元十年到二十九年，关于探马赤编入民社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最后还是以保持军队数目机密名义，让他们独自立社了事。探马赤军主要任务是征战和镇戍，而社是个农业生产组织。在战争频繁的年代，他们南征北讨，从事生产时间很有限，因此，他们是否成立了社以及是否参加生产，实在难说，很可能流于形式，甚至连形式也没有，仅成一纸空文。而我们一些同志仅仅根据至元十年的一道命令，就认为“大约从此以后，就有大批的回回军士在社的编制下，进行农垦，取得普通农民的身份”（同上）。这也应当斟酌。^①

以上两点，旨在澄清探马赤军和回回军的区分以及探马赤军入社的真实情况，说明探马赤的民族性并不显著，只是一种特种部队。至于它的名称、组织、性质和作用等，学术界研究者颇多，有些还有争论。这里就不重复了。

（三）最后要说明的是，我们虽然不承认探马赤军就是回回军，但并不否认回回军的存在。蒙古西征时，就有不少被征服的回回人编为军队，也有一些上层人士率其部属投降，他们以后被迁到中国，从事征伐。见于《元史》者，如元世祖至元七年七月“签诸道回回军”，至元八年九月“签西夏回回军”，至元九年五月“罢签回回军”，说明回回军确实不少。这也足为探马赤军不是回回军的一个证明。回回军既然散布诸道，为数甚多，无疑是回族的一个重要来源，也就不必用探马赤军的材料来作根据了。

二、三种不称回回的回回人

在元代，除个别例外，回回一词指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但是，当时还有一些中亚民族，虽然信奉伊斯兰教，却不称为回回，而是以原来的部族名称知名。这些人实际上是回回人的一部分，是回族的一个来源，因而应该称为回回人，也偶而被称为回回人，虽然当时还不普遍。据我所见到的资料，这些人有三种，即阿儿浑人、哈刺鲁人和一部分畏兀儿人。

（一）阿儿浑又称阿鲁浑、阿鲁温、阿刺温、合鲁温等名，是居住在今苏联中亚七河（Semirechye）流域至楚河（Chu）流域，即吉尔吉斯共和国全部及哈萨克共和国一部地区的突厥部族。在元代，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这有许多证据。首先，阿儿浑人居住的地区是哈

^① 参看杨诤《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历史研究》一九六五年第四期。

刺汗或喀喇汗王朝(十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初)的中心区域,而喀喇汗王朝从十世纪中叶后就信奉了伊斯兰教;其次,在元代,许多阿儿浑人的名字都用伊斯兰教的教名,如阿合马、哈散、木八刺等,而且多与回回人通婚;最后,元末又有径称阿儿浑人为回回人之例。如王祯《王忠文公集》卷二〇《漳州路达鲁花赤合鲁温侯墓表》说:

“迭里弥实,字子初,合鲁温氏,西域人也。”

而同书卷一四《书闻死事》则称:

“迭里弥实者字子初,回回人也。”《元史》卷一九六《忠义传》即据此文称迭里弥实为回回人。可以想见,到明朝,阿儿浑一名已被回回一名所代替了。^①

阿儿浑既与回回为一种人,因而见于《史元》的“阿儿浑军”(《元史》卷一二二《哈散纳传》),当然可视为回回军。

(二)哈刺鲁即唐代的葛逻禄,突厥诸部之一。最初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今新疆准噶尔盆地),其后徙西突厥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今苏联中亚的托克玛克)、怛逻斯(今苏联中亚的江布尔)诸城(《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九世纪中叶,回鹘为黠戛斯所破,一部分回鹘人迁到这里,与哈刺鲁人共建了喀喇汗王朝。十世纪中叶信奉了伊斯兰教。成吉思汗即位六年(一二一一)时,哈刺鲁国主阿儿思兰汗降附,成吉思汗以女妻之,后随蒙古军来到中国。元朝也有为数很多的哈刺鲁人。由于他们的名字多半是突厥或蒙古名称,又以哈刺鲁称其族名,因此从表面上看不出他们与回回人及伊斯兰教的联系,但他们之为伊斯兰教徒是肯定无疑的。除上述喀喇汗王朝之信教外,在元朝还有三件事例可作证明:

第一,根据拉施特《史集》记载,阿儿思兰汗归附成吉思汗后,成吉思汗称他为阿儿思兰——撒儿塔黑台。“即大食人阿儿思兰”。^②撒儿塔黑台是突厥——蒙古语,元代汉语译为回回。

第二,元人黄潜为答失蛮撰写的《宣徽使太保定国忠亮公神道碑》说,答失蛮“系出哈喇鲁氏”,他的曾祖叫马马,祖父叫阿里,父亲叫哈只,三个儿子叫买奴、忻都、怯来(《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四)。这些名字都是回回人常用的教名。

第三,元末人权衡《庚申外史》说,南宋灭亡后,小皇帝赵昀(瀛国公)自愿出家为僧。多年以后,有一蒙古贵族赵王怜他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与之”。当这位回回女子刚生下一男孩时,元明宗正从蒙古北部来,见赵昀所居寺上有龙文五彩气,即把母子带走。按,此回回女即明宗妃迈来迪,子即元顺帝。《元史·顺帝纪》说她是罕禄鲁(即哈刺鲁)氏,郡王阿儿思兰孙。这一故事把元顺帝说成是宋朝之后,不一定可信。但把哈刺鲁称为回回人,可见在元朝末年,社会上已把哈刺鲁看作回回人了。

因此,信奉伊斯兰教的哈刺鲁人也是构成回族的一个来源。在元代,哈刺鲁人当兵的也

① 参看拙著《元代的阿儿浑人》,《南开史学》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② 汉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二四七页。按,《史集》此处的大食(tāzīk),实指花剌子模,即回回国。

很多。从《元史》上看,即有合儿鲁(即哈刺鲁)军千户所(《元史·百官志二》),哈刺鲁万户府(同上),哈喇鲁军(《元史·也罕的斤传》)等名称。这也可算作回回军。

(三)在元代,畏兀儿人一般信仰佛教,这从《元史》有传的畏兀儿人中可以证明。据西方传教士记载,畏兀儿人也有信奉景教的。但是,畏兀儿人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那就是居住在今新疆的喀什(喀什噶尔)、叶城(叶儿羌)、和田(于阗)等处的畏兀儿人。这几处是喀喇汗王朝的领地,而回鹘(即畏兀儿)是喀喇汗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奇怪的是,这一带的畏兀儿人在元朝却多半被称为回回或只称其籍贯。如在元统元年(一三三三)考取进士的慕离(许有壬《至正集》卷六八《哈八石哀辞》作木屑),他的简历是:“贯大都路宛平县,回回于阗人氏。曾祖迷儿阿里,祖勘马刺丁,父哈八石”。(《元统元年进士录》)又如于阗人买述丁,他的谱系是:马合麻——撒的迷失——阿合麻(夫人阿鲁温氏)——买述丁(朱德润《存复斋集·资善大夫买公世德之碑铭》)。从名字上看,就可断定他们是伊斯兰教徒。《碑铭》称他是于阗人,不花刺氏,不说他是畏兀儿人。在《元统元年进士录》中,有四个人的籍贯是畏兀儿地区的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人,其中三人(寿同[海]涯、普达失里、道同)称畏吾人氏,另一人别罗沙,他的简历是:“贯西域别失八里人氏,字彦诚,曾祖木八刺,祖别鲁沙,父苦思丁,母回回人氏。”从名字上看,前三人不是穆斯林,因而称为畏吾(即畏兀儿)人氏。后一人则为穆斯林,虽与前三人籍贯相同,但不称畏兀儿人;而杨维桢的《西湖竹枝集》更明确指称:“别罗沙,字彦诚,回回人”,肯定其为回回人。为什么这样,我的理解是,在元代人的心目中,回回和畏兀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一个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个是信仰佛教的。因此,即令对出自一个种族的人,也要用不同的称呼表示区别。

畏兀儿人的普遍信奉伊斯兰教,应在明中叶,在内地的畏兀儿人,也多半以回回或回族自称,与回族融为一体。个别学者从历史上考证其出自畏兀儿,而以维吾尔族自称,当然也可以。我在西南联大时认识一位湖南同学翦万松,他就称为回族。可见在那时,湖南翦姓还未以维吾尔族自称。

以上说明,回族的来源是相当复杂的。元代的回回人固然是回族的一个主要来源(这里且不说回回还有泛指西域人或色目人的一个广义概念),而不以回回称呼的民族中也有些穆斯林,他们同样是回族的来源之一。

三、元末回回人的政治态度问题

在元末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中,回回人是否也卷了进去?可能有某些回回人由于各种情况参加到起义队伍中去,但没有具体可靠的资料来证实。从整体上看,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看来,有一些回回人是反对农民起义,甚至为元朝统治者做了殉葬品。

前节提到的阿儿浑人迭里弥实,《元史》把他列入《忠义传》(卷一九六),称他为回回人。

元末为漳州路达鲁花赤,有惠政。明兵攻取福州、泉州后,派招谕使到漳州招降。迭里弥实穿公服到厅堂,北面再拜,以斧斫破官印,又大书手版曰“大元臣子”,端坐拔佩刀自刎。《忠义传》又记回回人获独步丁,进士出身,曾官金广东廉访司事,元末闲居福州。福州为明兵攻下后,获独步丁说:“吾兄弟三人,皆忝进士,受国恩四十年,今虽无官守,然大节所在,其可辱乎!”即以石自系其腰,投井而死,获都步丁有二兄,一名穆鲁丁,官建康,一名海鲁丁,官信州,在此前皆死“国难”。又有出身乡贡进士的回回人纳速刺丁,为淮东宣慰司属吏,元末抵拒江淮起义军,后与张士诚军作战死(《元史》卷一九四)。哈刺鲁人伯颜是个很有成就的儒学家,四方从之来学者数千人。至正十八年为红巾军所获,以富贵诱之使降,伯颜不从,引颈受刃(《元史》卷一九〇《儒学传》)。

也有消极避世、苟全性命的人,回回诗人丁鹤年可为代表。丁鹤年出自世官家庭,父职马禄丁,官武昌县达鲁花赤,死于武昌。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徐寿辉军陷武昌,鹤年奉母避难,后至四明(浙江宁波)。方国珍据浙东,最忌色目人。鹤年转徙逃匿,或教书,或寄宿僧舍,卖药以自给。明朝建立后,鹤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国;元顺帝北遁,鹤年饮酒赋诗,情词凄恻。晚年学佛,榜所居曰逃禅室,实际上是一种避祸隐身、逃避现实的不得已的行动。^①

今天看来,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顽固的保皇派、与农民为敌的死硬分子;还可以说,这些人是统治阶级人物,不能代表广大的回回人民。这些看法原则上都不错。但是,我们总得承认,从种族或民族成分看,他们总是一方面即回回上层人物的代表,而这些人当时为数恐怕不会太少,因而他们的代表性还是很强的,此其一;在当时,回回人民参加农民起义的事例很难找到,除了记载不详之外,恐怕不能排除绝大多数回回人民是持观望或中立态度。此其二。

《元史》上有一段材料说:“至正三年六月,回回刺里五百余人渡河寇掠解、吉、隰等州。”(《元史》卷四一《顺帝纪》)。这是否是像有些同志认为的,是回回人民反抗元朝统治者的斗争呢?从客观效果上看,这一行动扰乱了元朝的统治秩序,有利于农民起义的发展。但刺里何人,史无记载,为什么渡河到山西,也难以说明。从《元史》字面看,刺里可以作为回回人名。但《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杂犯》条有“诸啰哩回回为民害者,从所在有司禁治”的记载;同书卷二〇《成宗纪》,元贞六年九月“中书省臣言:‘罗里等扰民,宜依例决遣置屯田所’。”啰哩、罗里与刺里显为同音异写(罗里在元代亦为回回人名)。从文义看,啰哩似为一批扰民帮伙,与元代所称的豪霸泼皮、今天所说的流氓无赖同义。波斯文 Luri,意为流浪者,恐即其对音。因此,刺里渡河事件是起义还是其它,实在可以怀疑,对这条材料的引用和解释应采取慎重态度。

至于传说朱元璋部下的反元大将如常遇春、胡大海、沐英、兰玉、冯胜、丁德兴等都是回

^①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丁鹤年传》;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一九《高士传》;参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

回,只能当作传说,不可轻易相信。这几个人《明史》上都有专传,他们是今安徽省淮河流域一带的人,有的还和朱元璋同乡里,假如其中有一个是回回人,史书上不会没有明确记载。在没有确凿证据以前,还是不引用为好。

我们还可举出一个反证,说明回回人在元代不是造反的人物。《元典章》卷四一《刑部三·谋反·乱言平民作歹》条载元武宗至大三年(一三一〇)的一宗案件说,一个以“庄农为业”的回回人木八刺,凭虚捏造“本庄住人小甲对他说:‘汉儿皇帝出世也,赵官家来也,汉儿人一个也不杀;则杀达达、回回,杀底一个没。’”又妄指村民拦十到他家说:“簸箕星下界也,达达家则有一年半也。”又对阿兰沙(当为回回人)说:“俺村里汉儿人每谋反”,邀其一同上告。这些诬告虽然受到应得的严惩,但这一事件说明,在回回人的心目中,只有汉人才会谋反,回回人是绝不会反对元朝的。这个木八刺是个以“庄农为生”的人,不是回回人的上层即统治集团人物。因此,他的语言和行动是有代表性的,值得注意和分析。

从宏观角度看,问题也很清楚。元末农民起义,主要是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这当然不错,但不应忽视民族矛盾这一重要因素的存在。这是元朝的国情决定的。大家知道,元朝是以蒙古族统治者为主而以色目人和汉人上层分子为辅组成的。为达到民族分化、分而治之的目的,她重用色目人,使其在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的地位都高于汉人。这自然会在汉人和蒙古人、色目人中间引起民族矛盾。在汉人看来,色目人和蒙古人是一丘之貉,都是压迫、剥削、歧视汉人的统治者,都是汉人痛恨的对象。早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当权臣阿合马专权、激起朝野人士的不满,由汉人益都千户王著刺而杀之的时候,客居在大都(今北京)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报道说,王著等人本来约定,要在夜间举火为号,杀尽一切有胡须的人,即蒙古人和色目人。《马可波罗行纪》中册三四二页)。这一报道在汉文记载中虽无直接证明,但它很可能反映了当时汉人社会上的一种情绪,即马可波罗说的:“契丹人(即北方汉人——引者)之厌恶大汗政府者,盖因其所任之长官是鞑靼人,而多为回教徒,待遇契丹人如同奴隶也。”

当然,个别的情况也有,如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之在云南,萨都刺之在镇江,畏兀儿人廉希宪之在陕西湖北,都办了些好事,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爱戴,受到汉人文士的好评,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情况并不多,民族矛盾依然尖锐,色目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愿或被迫地和蒙古统治者站在一条线上。这就是为什么在元末农民大起义时,回回人会以身“殉国”或消极逃避的原因。前面提到的方国珍据浙东,最忌色目人,使丁鹤年转徙逃匿的例子也说明,当时的色目人处境艰难、无路可投的狼狈情况。

另外,在蒙古统治者的眼中,当时造反的只是汉人,而没有蒙古人和色目人。《庚申外史》至正十二年记事说:

“(丞相)脱脱见盗贼四起,凡议军事,每回避汉人、南人。时方入内奏事,回顾中书韩伯高、韩大雅随后来,遽令门者勿入。奏曰:‘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

捕。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

可见元朝统治者是把色目人当作“自家人”看待的，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把他们召还京师，怕他们受到牵连，虽有防范之意，但还是从“爱护”的角度出发的。事实上，蒙古、色目人并没有受到诖误。请看十五年后（一三六七）朱元璋发布的北伐檄文：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太祖洪武实录》卷二一，吴元年）只是争取他们不要抗拒，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而已，并不要求他们参加起义，共同“驱逐胡虏”。这是很现实的，因为朱元璋君臣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要求回回人民同义军一道，共同进行反元斗争的。

总之，从元朝的统治政策和色目人的特殊地位来看，回回人不可能参加到元末农民起义的队伍中去，这是当时的客观情势决定的。即令有个别人物或集团有些骚动，如回回刺里的活动，也与汉人的反元斗争性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要求回回人参加反元斗争，倒是应该从他们的政治态度中受到启示，悟出一个道理来。

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

内蒙古大学 周清澍

唐朝国家盛强,经济繁荣,文化丰富多彩,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极盛的时代。唐朝前期的统治者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充满信心地开展经济和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然而在唐中叶以后,国势日趋衰落。五代时全国陷于四分五裂,王朝不断更迭。党项拓跋部兴起于今陕北和内蒙古相邻地区,一〇三八年首领元昊建国号大夏,建都于兴庆(今宁夏银川市)。在他即位前后,两次西攻回鹘,攻克甘州、西凉府、瓜州、沙州、肃州等地,占领了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的高昌回鹘、龟兹、于阗、黑韩国只有通过西夏境才能到达中原,而西夏与宋、辽等王朝又常以兵戎相见,这势必阻塞了丝绸之路的通行。金灭北宋,造成与南宋对峙的局面,与西域的联系更少。耶律大石西迁建国西辽,金人视为隐患,然对西辽的了解全是影影绰绰的传闻,只好遣使往西夏打听。夏国回报:“小国与和州(高昌回鹘中心,今吐鲁番)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①看来西夏同西辽的交往也有限。

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随后南下占领金漠南及中都(今北京)等地,降畏兀儿、哈刺鲁诸部,灭西辽、西夏,西征中亚。窝阔台继位,亲自南下灭金,由皇子阔端招降乌思藏(今西藏),派拔都等宗王远征东欧。蒙哥汗时,派长弟忽必烈灭大理,次弟旭烈兀远征八哈塔哈里发,建伊利汗国。元世祖忽必烈时,灭南宋,统一了全中国。从此,这片广大地区都归入蒙古大汗的一统天下,各方使臣、商旅、教士可以利用四通八达的驿路旅行,丝绸之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畅通。

近百年来,我国学者徐松、李文田、丁谦、王国维、冯承钧、向达等人已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国外学者布莱胥奈德搜集东方史料编注《据东亚史料之中世纪研究》(Bretschneider, E.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2 Vols. London, 1910),亨利·玉尔搜罗西方史料编成《契丹及通往彼方的道路》(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4 Vols. London. 1913—1916)。一九三〇年,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册,一九七七——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修订重印),集中了常见的中外史料。与张著出版同时,国内中西交通史之学颇盛,近年来更有进展。本文只是参据前人研究,间以己见,对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作简括的解说。

^① 《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

一、从蒙古通往中亚的道路

蒙古高原自秦、汉以来,匈奴、突厥等族相继建立了庞大的汗国,以西域为右臂。回鹘汗国败亡,各支就散迁到河西和天山南北各地。蒙古高原与西域各族历来相互交往密切,由于汉族对此所知甚少,在丰富的汉文史料中很少反映。蒙古建国后,前四朝定都于漠北,并先后设置了通往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利诸汗国的驿道,东西交通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方便。元朝实现全国的大统一,从中原地区也可以经漠北,越阿尔泰山前往西方,过去北方民族之间联系的通道,成为一个国家之内的另一条“丝绸之路”。

十二世纪初,女真崛起于我国东北地区。一一二〇——一一二二年,女真军相继克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辽天祚帝西奔,“自云中(今山西大同)而播迁夹山”。^①一一二四年,皇族耶律大石因被天祚帝猜疑,“不自安,自立为王,率铁骑二百宵遁。北行三日,过黑水(今内蒙古达茂旗北艾不盖河)”。西至可敦城(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东,辽设镇州),召集边地七州、十八部的部众,得精兵万人。据波斯史料记载,他先率兵进攻吉利吉思地区(《辽史》卷三六、四六《兵卫志》、《百官志》作辖戛斯,系辽属国),遭到各部落的反抗,可能因此又退回可敦城。一一三〇年,他整顿军旅西行,事先遣使向高昌回鹘主借道,然后由和州到达叶密立(今新疆额敏河附近),于此建城,正式称帝,继承辽统,仍沿用辽国号,或称哈喇契丹。后建都于八剌沙衮(又称虎思斡耳朵,今苏联托克马克)。大石从这里派兵再征吉利吉思,派官员(沙黑纳)统治谦谦州。^②并使康里和粘八思(即乃蛮)接受他所降的牌印,成为辽的属部。^③从耶律大石几次行军路线似可揣想,当时漠北可经天山南北回鹘境往西域,也可以从八剌沙衮北上经康里入境,由准噶尔盆地北沿至阿尔泰山的乃蛮境,还可以再向北直接去吉利吉思。蒙元时期,中外旅行家来往于此道路的甚多,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这几条道路的经行路线。

(一) 天山北路线

十二世纪中,克烈部王汗遭到乃蛮亦难察汗的攻击,逃往楚河畔的西辽首都。后又经畏兀儿、西夏回来。^④可见蒙古各部与畏兀儿、西辽常有联系。乃蛮附属于西辽,聘请畏兀儿

①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云内州治所柔服县下:“夹山在城北六十里”。云内州和柔服县城址即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北部古城公社之古城,此城正北六十里,夹枪盘河的大青山一段山谷就是夹山。参看拙文《汪古部的领地及其统治制度》,载《文史》第十四辑,第一七九页。

② Juvain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 355;《辽史》卷三《天祚帝纪·附》。

③ 《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

④ 《元朝秘史》第一五一、一五二、一七七节。

人塔塔统阿为傅,^①关系则更加密切。

畏兀儿降附蒙古以后,从蒙古经畏兀儿到西域无须假道了。好些留下游记的旅行家都是走的这条路。一二二〇年,金朝遣礼部侍郎乌古孙仲端出使蒙古。当时成吉思汗已经西征,他又追至西域。据其所述《北使记》载:“自〔兴定〕四年(一二二〇)冬十二月,初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浸高,……山之东水尽东,山之西水尽西,地浸下。又前四五千里,地甚燥,历城百余。……又几万里,至回纥国之益离城,……时已四月上旬矣。”《元史·太祖纪》载:“十六年辛巳(一二二一)夏四月,驻蹕铁门关,金主遣乌古孙仲端奉国书请和。”上引文字很抽象,只有益离一个地名,但从“冬十二月”向西北进发分析,他不可能走北边冰雪封山的隘口,可能是走较南的山口沿布尔根、乌伦古河而西,然后向南走天山北路,到达伊犁河谷的益离(今伊宁市)。

全真教道士丘处机被成吉思汗召往西域,从莱州(今山东掖县)出发,经中都,到漠北,西越金山(阿尔泰山),直到撒马耳干等地,其弟子李志常作《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了此行的详情。这里先截取金山往西一段路程进行探讨:“〔辛巳(一二二一)〕中秋日,抵金山东北,少驻,复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长坂,车不可行,三太子出军始辟其路。乃命百骑挽绳悬轭以上,缚轮以下,约行四程,连度五岭,南出山前,临河止泊。”长春由金山东北南下,所经之“深谷长坂”,当为乌兰达坂隘口。出山以后,“临河止泊”,应为乌伦古河与青吉里河会合处。

下一段是折而往南,《记》中说:“渡河而南,前经小山,石杂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又三十里,碱卤地中有一小沙井。……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约行二百余里,达沙陀北边,颇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余里,……及回纥城,……八月二十七日,抵阴山后,回纥郊迎,至小城北。”“渡河”指渡乌伦古河。现在从新疆青河县南下,经过此河北岸的二台,有公路可达奇台等地。二台以南一百里处,有地名叫大布逊。大布逊(dabusun)是蒙语词,意为盐,当指此“碱卤地”。稍南有哲克森井,似指此“小沙井”。白骨甸即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阴山后的小城,可能是今奇台古城或其以东某城。奇台古城当时名独山城,成吉思汗西征时经畏兀儿人哈刺亦哈赤北鲁父子督民户垦辟,农作颇有恢复。^②

下文说:“翌日,沿川西行,历二小城,皆有居人。……西即鳖思马大城。……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轮台之东。……又历二城。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刺城。翌日,傍阴山而西约十程,又度沙场。……南际阴山之麓。踰沙又五日,宿阴山北。诘朝南行长坂七八十里,……晨起西南行约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圆几二百里,雪峰环之。……沿池正南下,左右峰峦峭拔,松栎阴森,……众流入峡,奔腾汹涌,曲折弯环可六七里,二太子扈从西征,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翌日方出,入东西大川,……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鳖思马大城即别失八里(Beshbaliq),Besh 突厥语意为五,baliq 意为城,b,m在突厥语中读音易混,

① 《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统阿传》。

② 《元史》卷一二四《哈刺亦哈赤北鲁传》。

故ba读成了ma。耶律铸云:“后汉车师后王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①高昌回鹘以此城为夏都,即今新疆济木萨尔北后堡子以北之破城子。轮台是唐庭州属县,在今米泉县。昌八刺《元史·地理志》作彰八里,即今昌吉。由此往西,沿天山北麓西行,与今通往伊宁的公路一致。北临沙漠,故称沙场。踰沙五日,从阴山(天山)北穿“长坂”南行,所见“方圆几二百里”之池,即赛里木湖。沿池而下的山峡,今名塔勒奇山峡,俗称果子沟。出沟所入的东西大川,即伊犁河谷。最后到达阿里马城,《元史·地理志》作阿力麻里,即今新疆霍城县西北克根河西岸阿尔泰古城。此城原为一个穆斯林首领脱忽鲁儿汗不扎儿所据,附庸于西辽。一二一八年,西辽屈出律汗捕杀不扎儿汗,并攻打阿力麻里。哲别军至,屈出律南逃,阿力麻里降于蒙古。

《西游记》除了详细记述所经道途外,还报导了三太子(窝阔台)在阿尔泰山乌兰达阪山口“始辟其路”,二太子(察合台)在塔勒奇山峡“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等事实,当然在后来正式设置驿路后还会有更大的改善,但西征客观上确实对东西交通起了促进作用。

耶律楚材于一二一九年扈从成吉思汗西征,提到的地名几乎与丘处机一致,然而我将在后文论及,成吉思汗西征并没有走天山北路,所以怀疑是他回程所经。向达明师在他校注的《西游录》前言中作出了肯定的结论,不仅解决了我心中的疑窦,并且判断此行在一二二四——一二二五年之间,故附于丘处机西行之后。由于耶律楚材往返都未经过乌伦古河南穿白骨甸的道路,所以他没有涉及。过金山后他就说南隅有别石把(即别失八里),再西有轮台县,与丘处机的行程一致。只是他由阿力麻里返回时,过阴山后是北去不刺城,再由不刺到轮台,故称“过瀚海军(别失八里)千余里,有不刺城”,“不刺之南有阴山”。不刺《元史·地理志》作普刺,即今新疆博乐县西五公里古城。从别失八里去今伊犁地区,不刺不在必经途中,故丘处机没有提到。在耶律楚材的诗中,具体指出了长春由赛里木湖南下时经过的“左右峰峦峭拔,松桦阴森”之处名松关。他还指出长春出峡后所见的东西大川名曰亦列,即今之伊犁河。^②

一二五四——一二五五年,已降附蒙古的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奉召去谒见拔都和蒙哥汗,由拔都营帐到达哈刺和林。在他的《行记》中,离哈刺和林西返时,走的是丘处机同一条道,但提供了更详细的旅程:先经过横相乙儿(Qum—Sengir),南下至独山城(Berbalıq),西行经别失八里(Beşbalıq)、耶勒(Yarlir,今柏杨驿)、俱六(Küllug,今阜康)、Engag和彰八里(Janbalıq)、古塔巴(Qutapai,今呼图壁)、仰吉八里(Yangıbalıq,今玛纳斯河西)、额果波罗(Ergop'orug)、丁柯八里(Dingbalıq,今精河)、普刺(Pulad)、苏特库耳(Sutk'ol Sut-köl,乳海,即赛里木湖)、阿力麻里(Alimalik)、亦刺八里(Ilibalıq,即今伊宁市),渡过亦刺速(Hınsu,即伊犁河),越过拖罗斯山(Töros)山的分支(即阿拉套山)到达塔刺思(Talas,今苏联塔拉斯

① 《双溪醉隐集》卷五。

② 耶律楚材:《西游录》,向达校注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